

多方协同推进网络谣言治理

□ 陆小华

谣言是古已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借助网络传播、移动传播、社交传播、智能传播等传播形态的特有条件而具有更快流速度、更大波及面。谣的本义是徒歌，即随口唱出、无音乐伴奏的清唱；泛指谣谚、歌谣；又指谣传。《新华大字典》把谣言定义为“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谣言存在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之所以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能被古人口耳相传、今人在网络上传播，原因之一是所流传的东西有某些方面迎合了大众的某些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从而一般人容易接受甚至相信。

在网络传播条件下，谣言传播变得更加具有流传性与冲击力，不仅信息如潮覆盖，而且信息推送找人；不仅是一般性流传，而且因为是社交平台上熟人所发而更易于接受和相信；谣言不仅包装得易于传播和接受，而且可能虚假信息伴以似真信息左右，难以分辨；再加上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服务技术的运用，算法所推送信息是基于对用户信息需求偏好、行为特点甚至是个性弱点的累积画像和实时捕捉进行，既推送有事实依据内容，也可能推送了事实依据不足甚至虚假信息。这既显示出网络谣言治理

的特殊难度，也更凸显治理网络谣言的紧迫性、重要性。

梳理网络谣言现象传播机理、传播链条，涉及社会多个方面，包括所涉主体、互联网平台、内容制作者、传播者、公众和监管部门，建立、优化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就要在基于共识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

社会主体有效沟通是减少网络谣言产生的前提。谣言止于真相。要想实现更主动的网络谣言治理，所有社会主体，特别是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学校以及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等，都要进一步增强内部管理、公共治理和公共沟通等能力，进一步增强以人民为中心履行职责的工作成效，从而有效削减相关谣言可能产生的概率。现代社会治理之所以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流言止于智者”，就是因为从源头上看有些工作不到位，给网络上各种想象留下了产生土壤，给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留出了空间。这其中，既包括所涉社会主体对内部人员、事务等管理不到位，行业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不到位，也包括新闻发布、公共沟通发布不到位。更需改善的是对社会情绪、心理脉动的及

时感知和巧妙抚慰，是对社会关切、信息需求的敏锐发现和及时回应，是对连带问题、质疑动向的警觉防范和及时处置，是对重要事实、工作措施的及时发布和多元沟通，等等。概括而言，不仅要把工作做到位，还要把沟通做到位；不仅要把民生服务做好，还要把民众心理需求和情绪脉动把握好。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会相信传言甚至会转发后来被证实的网络谣言，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理由，即网络上戏谑而言的“谣言，有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客观上，有些口耳相传的流言被后来传播出的事实所印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传言的接受心理和接受可能，从而使“无事实依据、凭空捏造的传言”也有了更多被接受的可能。有学者指出，谣言产生与相关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即事件越重要却又越信息缺失，谣言产生的可能性与其效应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两因素趋向零时，即变成不重要或信息充分时，谣言就没有产生与传播空间了。

互联网平台必须负起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主体责任。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大差异，就是前者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传播为基本特征。不仅传播，相当多数与谣言相关内容制作也须借助互联网

平台才得以完成。总体上看，口耳相传效率很低、不断变化；没有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分发平台等的助力，网络谣言就不可能有如此大传播力和破坏力。互联网平台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还需要根据自己平台的传播特性、技术特性、运行方式等制定一系列防范、识别、治理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则，形成有效内部治理机制，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在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上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平台功能。

公众必须增强网络谣言的识别、抑制、排斥能力。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公众既可能是相关谣言内容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传播者，甚至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相关谣言内容的制作者。让公众不传谣的前提是不信谣，不信谣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谣言识别能力。网络谣言尽管多变，仍然有一系列特征可以识别。增强警觉之心和识别能力，就可以少受网络谣言的侵害，更可以避免不当转发。最重要的还在于政府要切实提高监管能力。要进一步织密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增强包括科技手段在内的监管能力，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相关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素养和预防、识别能力，从而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导，实现更主动网络谣言治理。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深度融合

□ 杨 翔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深入阐释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方向和路径。数字化时代，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我国正不断推动大数据战略目标的实施，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数字中国”和“智慧中国”的构建正稳步推进。大数据可以对信息进行全新的分析。通过“一切事物皆可量化”的大数据技术优势，深入发掘和扩展数据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与传统定量、定性分析方法的高度结合，使思想行为信息能够更高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状况全貌，为开展好思政教育提供基本前提。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解构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给思政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文化角度看，大数据不断冲击着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导地位，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环境；从传播角度看，大数据使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形态日益呈现出载体迷你化、信息精简化、对象细分化、结构扁平化的趋势；从技术角度看，大数据能够有效获取和分析信息数据，使思政教育实践更加优化和科学。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界对如何在大数据语境下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中进一步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中构建面向全体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体系、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中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灌输论色彩等，都是思想政治治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

应对能力尚有不足。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的数据中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提取有效信息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和解剖，这就要求教育者要掌握大数据特有的分析方法，而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界恰恰缺失这方面的知识准备，由此导致实践中难以形成客观科学的数据支持体系和可操作性方法。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制定的主管部门、实施教育行为的各类学校、作为施教者的任课教师还是舆论宣传的主流媒体，都尚未具备适应大数据环境的数据分析能力和思想方法，不少人甚至对大数据环境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冲击的严峻性认识不足。由于施教者无法应对受教育者多元化的思想认识，导致其与受教育者在信息传递和良性互动方面出现了问题，单向度教育的特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动力不足，难以产生预期效果。

应对方案相对单一。大数据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由原来的学科建设、教学创新和研究创新向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构建面向全体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体系、消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论色彩等方面转变。然而，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多为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信息的简单组合，教育方式及传播技术落伍于时代。一方面，简单的灌输式教育在面向大学生、党员干部、中产阶层及普通民众等不同群体时

针对性不足；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新媒体个性化的特性融合不到位，在利用智慧设备和社会化媒体及时捕捉受众的思想动态方面极为不足。由于缺乏大数据平台，数据模块和思想政治教育环节无法有效对接，难以获得有效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教育实效性的数据信息。部分学校或APP虽利用智慧信息系统采集了学生或用户的基本数据，但没有更进一步对其思想动态、关注取向等数据进行提炼，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靶向性和精准度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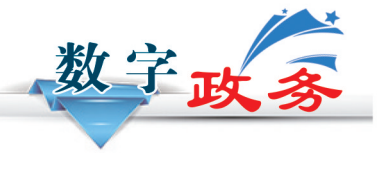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与大数据深度融合

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细化数据采集。海量的数据信息是解密社会思想动态和探究其趋向规律的钥匙，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移动终端以及各类智能APP产生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不能只是进行简单的归纳统计，而应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得到有效应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一方面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日益嵌入大数据的时代环境，另一方面使得对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数据信息的掌握和分析变成了可能，这为看似不相关、无价值的数据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属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及管理全过程的创新形成了重要推动。因此精细化采集、储存海量个体的非结构化数据成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

利用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靶向化提供技术支持。大数据的重要功能就是数据分析。把用户日常数据纳入大数据这一技术模块下进

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再将运算结果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靶向化的基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运用新技术实现对数据沉积的深入挖掘和分析，量化受教育者的生活状态、学习进度、成长情况，进而勾勒出精准的“学生画像”，为教育管理和引导的靶向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换言之，大数据能够将受教育者群体进行分类分层，精准分析用户对时政热点的关注、舆论动向，及时加以有效精准引导，让不同群体与适合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匹配，最终实现对受教育者群体的“量体裁衣”，这样才能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无死角、全覆盖、有实效。也正是这样，才可以有效开发出更多令人喜闻乐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利用大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思政教育工作者通常缺乏“大数据意识”和“技术素养”，不善于将大数据技术融入课程讲授和教育引导中。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能够打破传统课堂“必须在场”的物理空间限制，将受教育者从程序化、流程化、应试化中解放出来，变灌输式知识讲授为互动式的思想交流。同时，大数据技术还改变了传统学习的时间安排，从过去固定的上课时间变成随时随地的学习、讨论、提高，让受教育者可以更加自由、主动地融入到知识学习的环节中。



理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做到“九个加快”：加快按照企业出题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落实产教深度融合双导师协同育人、加快产学研合作打通前后端创新链、加快激发应用牵引基础研究活力、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联合国防院所推进军民融合、加快联合科技企业攻关重大项目争取大成果、加快建设人才共引共用共培新机制、加快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机制。

弘扬西迁精神，为学校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坚实思想保障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

中央深改委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潜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让数据要素的获取、加工、流通、利用以及收益分配等行为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最终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的提升。可以说，《意见》的出台正式拉开了我国数据产权制度从宏观政策主张走向具体制度实践的序幕。未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作用。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对数据要素的使用是区分数字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特征之一。数据赋能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驱动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各国纷纷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数据资源、数据处理技术、数据产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竞争，数据要素的流通利用也已成为国际竞合焦点。通过夯实数据基础制度，有助于统筹全国大市场的资源配置，抢占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优势，加快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高效促进数据流通交易。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可以通过流通实现增值。《意见》对数据流通和交易进行区分，交易仅是数据流通的一种方式，数据还可以通过共享、开放、数据服务等方式实现流通。在数据交易方式上，国家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总体来看，无论数据流通还是数据交易，均以合规为基础，以高效为目标。合规的要求可以转化为对数据来源、数据用途、数据流转过程的规范化；高效的要求则可以转化为为进一步对数据交易场所统筹建设和数据流通标准引领作用的提升。

科学分类数据资源。《意见》依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进行数据分类，涉及不同的确权 and 授权规则。对于公共数据，明确其定义为各级政府部门、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鼓励以多种形式向社会提供不涉及个人信息、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对于企业数据，泛指所有持有数据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资产，与公共数据形成对应关系；对于个人数据，采集、处理和流转，则需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要求。数据资源学的科学分类，有助于推进数据确权与授权进程。

保障数据处理者的投入收益。制度坚持“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基本原则，保障了数据处理者的投入能够获得合理收益的权利，从而形成正向激励。同时，通过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产权进行合理保护，为数据使用者合法持有数据、有效使用数据并通过数据流转获得收益提供依据，也为各市场主体提供了利好因素。

保护数据来源者的权益。数据处理者持有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于数据来源者（例如平台商家、消费者、IoT设备使用者等），数据处理者持有、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数据，需要获得数据来源者的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以确保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转移由其促成所产生数据的权利。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推动数据来源者合理分享数据要素价值。未来将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逐步形成合理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

数据收益分配将兼顾效率和公平。在数据要素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依然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按贡献大小分配收益依然是基础性规则。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方面，《意见》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通过持续深化数据开放，向社会释放公共数据红利。大型数据企业在数据流通、处理以及提升公众数据素养等方面担负更多社会责任，消弭数字鸿沟促进收益分配的公平。

确保数据安全。数据滥用、算法陷阱、信息茧房已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和担忧，甚至可以制造舆论轰炸、影响社会稳



□ 张晓

定。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要始终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明确监管红线，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逐步形成数据权责清单、权责监督机制、安全事件应对机制。在监管要求上应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通过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压实企业数据安全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维护数字经济良性竞争。尽管“数据垄断”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不排除监管部门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规定，数据来源者也可要求数字平台企业提供访问和携带数据的便利，批量提供其日常经营所产生的交易数据，并且流通给竞争对手或者第三方数据经营者，进而改变整个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竞争态势。

促进数据治理体系多方协同。数据治理将以战略目标为统领，多方协同、多管齐下，尤其注重人的能动因素，各司其职、发挥所长，深化协同治理的信任关系，弥补政府、市场和社会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打造和谐生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等参与主体在数据治理生态中的功能和作用，根据不同主体在资源、信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各方共同的利益。

有序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将以人民福祉为根本，以安全和发展协调一致为考量，最大限度激发数字化转型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数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美好需求。在此过程中，将努力寻求多重目标的动态平衡，例如，保障网络数据安全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平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规范监管的平衡；不同数据要素权益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统筹和区域数据交易试点的平衡；国内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国际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平衡等。

总的来说，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形成“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二元结构，充分体现了兼顾促进数据要素利用和平衡数据收益分配的理念。数据需要通过流动汇聚才能发挥作用，通常需要跨越行政部门的职能边界，该制度设计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突出强调数据产权核心制度，有利于将数据优势转化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并将对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地位 and 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题。

必须看到，当前产学研深度融合下的创新人才培养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积极发挥高校主动、政府主推、企业主体、人才主力、市场主导的作用，汇聚创新资源、引入金融资本、对接企业需求、建立良好生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互动融合。着力在校内建设校企合作新

型研发平台，破解大学研究人员因科研资源集中在校园内而无法长期到企业创新创业的难题，重点引进龙头企业牵头科研院所进入创新港建立“四主体一联合”研发平台，坚持以企业作为需求主体、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着力推动打通创新全链条，校企联合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的研发团队，打通前后端创新链，弥补共性技术不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方面将现有存量技术成果更好地“端”给企业，另一方面针对企业需求孵化新的增量技术成果，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着力探索一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人才培养与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更好结合推动产教融合，把

人才培养与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推动科教融合，推进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探索实行校企联合的“科学家+工程师”双导师制、应用需求牵引基础科研研究的“前端+后端”双导师制、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学科交叉双（多）导师制，形成教研一体、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攻关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通过实践，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论述立意深远、内涵丰富、科学系统，既在宏观战略上指明了方向，也在具体策略中明确了路径，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我们必须不断提升“政治三力”，树立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深刻

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迁精神的深刻阐释为学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政治方向、勾勒了发展路径、明确了目标要求，给予了全校师生巨大关怀和极大鼓舞。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西迁精神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是全体交大人、西部建设者和科教战线的荣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等教育战线必须深刻把握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立足两个大局，自觉把握“国之大者”对一流大学的要求，听党指挥跟党走，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

急、应国家之所需；必须主动担负国家使命，在创新中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不足，既要直面问题，又要坚定信心，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努力实现跨越发展。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从国际视野看交大、从国家战略看交大、跳出交大看交大，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以“听党指挥跟党走”的实际行动和一流创新人才培养的扎实贡献，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